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
馆员笔谈资料汇编



刘雨珍
编校

上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 / 刘雨珍编校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01 - 06829 - 9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史料—清代 IV. ①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40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 tjrmcbs. com. cn](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 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47.75 印张 8 插页

字数:740 千字 印数:1 - 2,000

定 价:125.00 元

(上、下册)

前 言

一、《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与首届驻日公使的赴日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而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则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总理衙门担心日本在条约中援引欧美各国对华立约条款,故援引《礼记·学记》中“大信不约”之语,予以拒绝,而李鸿章与曾国藩则力主与日订约。1871年6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议约。尽管明治新政府为美、英、法等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却企图援引西方列强之例,将不平等特权列入条约。李鸿章则在曾国藩的提议下,坚决不肯将“一体均沾”的字样写入条文。经过长达数月的交涉,最终于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下同),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全称《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虽然明治政府以为条约有欠妥之处,于翌年5月派遣柳原前光再次来华,要求改约,但李鸿章坚决不允。明治政府见清廷态度坚决,成约难以更改,乃于1873年3月,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华换约。^①

《中日修好条规》共计十八条,其中包括如下几条重要内容:

第一条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第二条 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第四条 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经过内地各处,所有费用均系自备。其租赁地基房屋作为大臣等

^① 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一章“中日始订修好条规”,三联书店2005年版,29—44页。

公馆,并行李往来及专差送文等事,均须妥为照料。

第六条 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同治条约》卷二十)

第一条乃对所属领土互不侵犯之规定,此后中日两国在围绕琉球归属进行交涉时,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曾屡加引用。第二条被欧美各国驻日公使疑为中日结盟,招致不满。第四条乃为互派使节之规定,而第六条对于往来公文使用汉文之规定,对近代中日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条规,明治政府于1874年2月派遣柳原前光为公使来华驻扎。由于该年发生日本入侵台湾事件,清廷派遣驻日公使之事稍有延缓。

1877年1月15日(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因日本爆发西南战争,赴任被迫延期。据何如璋《使东述略》记载,8月17日(七月初九)由军机处颁发敕书及国书,9月10日(八月初四)离京。9月14日(八月初八)抵达天津,拜谒李鸿章,“语使事颇详”,并会晤继任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10月25日(九月十九日)抵达上海吴淞口,继而赴南京面见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请派兵船东渡,沈葆楨乃命“海安”号护送。11月23日(十月十九日),奏报出洋日期及所带随行人员,11月26日(十月二十二日)晚,偕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登上“海安”号兵船。翌日,船出吴淞,11月30日(十月二十六日)抵达日本长崎,中日双方各放礼炮二十一响,互为敬意。后泊神户,一行登岸,日人观者如堵,“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日人间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一行游览大阪、京都、神户后,于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抵达横滨,宿外务省准备之行馆。20日,何如璋派黄遵宪赴东京,面见外务卿寺岛宗则,22日何如璋偕副使张斯桂入京,会晤外务卿寺岛宗则、外务大辅鮫岛尚信,“钞国书稿示之”。^①

另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照会资料,^②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于1877年12月19日(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抵日后的第一号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何、副使张为照会事

本大臣奉使贵国,于我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自上海起行,二十六日到长崎,十一月初三日到神户,十二日到横滨,接见神奈川县令并贵外务省

^① 参见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卷二所收《使东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65—82页。

^②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国钦差出使以来照会覆》。

一等属官,情意殷勤,具征两国格外和睦,本大臣实深感悦。

兹本大臣于日内陆续搬运行李上岸,暂在贵出张所居住数日,所有随带官员、亲属、仆役等共五十人先开清单,送被查照。除在横滨一面租房,与理事等官分驻外,特遣参赞黄遵宪、洋员麦嘉缔先到东京租赁公馆,望贵外务省妥为照料。一俟租定后,本大臣当即束装来京与贵大臣把晤,藉亲懿范,以笃和衷,本大臣不胜欣幸之至。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大日本国外务省卿寺岛

光緒叁年拾壹月拾伍日

该照会对公使一行的出发及抵日时间进行了详细通报,并言将派遣参赞黄遵宪及洋员麦嘉缔赴东京租赁公馆。此外,该照会还附有下列“国书抄稿”及一行名单:

一、国书抄稿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往驻贵国都城,并令亲贵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冀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

大清光緒三年七月初五日

二、名单

参赞官:黄遵宪

洋 员:麦嘉缔

正领事官:范锡朋

副理事官:余隽

翻译官:沈鼎钟、张宗良、潘任邦、冯昭炜

随 员:沈文荧、陈文史、廖锡恩、吴广需、张鸿淇、陈衍范、何定求、
任敬和、刘坤

亲 属:何其毅、张子菁、施积型、张德耀、罗贞意

又共其仆役二十八人

12月24日,外务卿寺岛宗则将国书抄稿及一行名单抄送给太政大臣三条

实美,并约定 28 日上午 11 时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①

12 月 28 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何如璋偕张斯桂、黄遵宪在外务卿、宫内卿、式部头(按:皇宫典礼长)的引导下,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使东述略》)。下午,拜会太政官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以及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人。

1878 年 1 月 15 日(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黄遵宪租下位于东京芝山增上寺内的月界院作为公使馆公馆,并于 1 月 23 日(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横滨的出张所搬入。虽然四周幽静,环境优美,但由于空间太过逼仄,最终公使馆于该年 11 月迁至位于永田町的原华族会馆新址。本书所收的笔谈,不少即以此二处为舞台而展开。

公使馆在月界院安置妥当后,何如璋、张斯桂于 1878 年 2 月 7 日(光绪四年正月初六)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第七号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何、副使张为照会事

本大臣于东京择定芝山月界院作为公署,于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横滨移驻,所带官员、亲属、通事、并仆役人等,自应开单,恳飭地方官知照。因在我国度岁之期、故未及行照会,旋于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接到尊函,具悉厚意。兹合将单送来,即烦贵大臣飭地方官查照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计单

右照会

大日本国外务省卿 寺岛

光绪肆年正月初陆日

官员

参赞官:黄遵宪

洋 员:麦嘉缔

翻译官:沈鼎钟

翻译官:冯昭炜

随 员:沈文荧

^① 参见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卷,日本国际联合会 1949 年版,188—190 页。然《日本外交文书》所引文字稍有不同,即国书草稿中“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作“二品顶戴 用翰林院侍讲用”,“三品顶戴”作“三品顶戴”,名单中参赞官前尚有“正使 何如璋,副使 张斯桂”,“余隽”作“余携”,“任敬和”作“仁敬和”,无“又共其仆役二十八人”等字。

随 员:陈文史

随 员:廖锡恩

随 员:张鸿淇

随 员:陈衍范

随 员:何定求

随 员:任敬和

随 员:刘 坤

亲 属:何其毅、张子菁、施积型、张德耀

通 事:钜鹿赫泰(日本国长崎县人)

又通共仆役二十六人:

范升、朱升、江天育、张德、宋全有、吴升、纪贵、郎升、郑福、洪仁、梁玉、古金、江林玉、黄三、薛坤、费德、王裕三、邹顺、马升、王升、叶仁、薛贵、陈龙。

初村盛四郎(年十七岁,日本国长崎县人)

汤日常次郎(年二十六岁,日本国广岛县人)

石川兼吉(年二十岁,日本国东京府人)

该照会通报了公使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所带官员、亲属、通事及仆役等详细清单,与前述第一号照会相比,名单中已无赴任横滨及长崎的理事官范锡朋及余隽等人,而增加了日人通事及仆役 26 人(包括 3 名日本人)。

另外,前述翻译官中,沈鼎钟、张宗良及后任的杨枢皆为西文翻译官,而东文翻译官冯昭炜后调任驻神户领事,留在东京的潘任邦亦于 1878 年 8 月因病归国,何如璋等人的活动大多需要通过从天津带去的日本通事钜鹿赫泰(又名钜鹿赫太郎,中文名魏梨门、魏鲤门等)进行翻译,因此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着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①这也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诚如汉学家石川鸿斋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跋中所述:“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②造访公使馆的

① 参见王宝平:《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年第五期;阎立:《清末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日语认识》第五章“清国首届驻日公使馆团与日语”,(日)东方书店 2009 年版,187—241 页。

② 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 1985 年版,793 页。

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了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二、笔谈的主要参加者及笔谈资料的整理收藏情况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下面就参考相关资料,对本书笔谈的主要参加者以及笔谈资料的整理收藏情况予以说明。

(一) 中国人

参加本书各编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外,还有明治初期旅居东京的民间文人,以及短期游历日本的观光者。

1. 驻日公使馆员

虽然本书收录了不少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的有关笔谈,但总体而言,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之中参加笔谈最多者,应属参赞官黄遵宪及随员沈文荧。

何如璋(1838—1891) 乳名行扬,字衍信,号子峨,别号璞山^①,广东大埔人。1861年中举,1868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75年升翰林院侍讲,1877年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钦差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1882年任满归国,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任福建船政大臣,补授詹事府少詹士。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战败,遭革职遣戍张家口。1888年释回故里,主持潮州韩山书院,1891年病逝。著有《使东杂咏》、《使东述略》、《袖海楼诗草》、《管子析疑》等,除《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外,其他诗文稿大都收入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张斯桂(1817—1888) 字鲁生,浙江慈溪(今宁波市)人。1855年开始担任清廷引进的第一艘现代海轮“宝顺轮”船长,在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屡败海

^① 以上字号据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学界著述多作“何如璋,字子峨”,而据1878年2月25日何如璋与大河内辉声笔谈原件中所作的自我介绍:“仆名如璋,字璞山,号子峨。”(见本书第一编“戊寅笔话”第三卷第23话),另据1878年10月15日何子纶与增田贡笔谈:“家兄号子峨”(见本书第五编二),可知“子峨”确非何如璋之字,乃其号也。

盗,战绩卓越。1862年在李鸿章军营任职,次年充曾国藩幕僚。1863年为丁韪良(W. A. P. Martin)汉译《万国公法》作序,以春秋列国比拟中国与欧美诸国,并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振兴,对中日两国知识界产生深远影响。1874年日本以台湾土著人误杀琉球船民为借口,悍然发动侵台战争,张斯桂随钦差大臣沈葆楨赴台交涉。后由沈葆楨极力举荐,得以步入外交舞台。1877年以三品顶戴候选知府出任钦差副使大臣,1882年任满回国选授直隶广平府知府,1888年卒于官。著有《使东诗录》、《游艺斋杂著》等。^①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中举,1877年以五品衔即选知县任首届驻日公使馆参赞官,1882年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890年任驻英二等参赞,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奉召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8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同年以三品京堂派充出使日本钦差大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放归故里,1905年病逝。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其著作大都由陈铮先生编入《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第五编“笔谈”即收录了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冈千仞、增田贡、金宏集等的笔谈资料。

沈文荧(1838—1880?)字梅史,号春萍馆,浙江余姚人,擅诗词书画,通音律。据其1878年3月3日与大河内辉声笔谈及1879年12月11日与增田贡笔谈可知,同治年间太平军攻占余姚时,曾率民兵抗击。后北上应礼部试,1865年投身于陕西提督雷正綰帐下,转战关外,跋涉于天山葱岭之间。1877年以正五品陕西省候补直隶州知州任公使馆随员,1879年底丁忧回国,旋即去世。著有《春萍馆诗草》、《春萍馆外集》、《名石斋古文稿》等。

此外,参加本书笔谈的首届公使馆员尚有廖锡恩(字枢仙)、潘任邦(字勉蹇)、何定求(字子纶)、刘寿铿(字小彭)、梁居实(号诗五)、黄遵楷(号幼达)、杨枢(字星垣)、任敬和(字谦斋)、陈衍范(号访仲)、刘坤(字静臣)等人。

2. 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

除上述公使馆员等正式外交使节外,明治初年的东京还活跃着一群中国民间文人,包括《大河内文书》中频繁出现的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王藩清以及张滋昉、冯雪卿等人,他们自明治初期即长期旅居日本,虽在本国名不见经传,却颇受日本友人厚爱,频频出入贵族豪门,或教授汉语,或侍宴

^① 详见龚纓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1卷第六期,2008年11月。

酬唱,或题字赠画,或作序评诗,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民间力量。

王仁乾(1853—?) 字惕斋,浙江慈溪人。1870年赴日,主要经营书店,专售汉籍和文具。1877年末于浅草黑船町开设“凌云阁”,翌年初迁至筑地入船町。直至清末一直旅居日本。著有《无师自通东语录》,为我国最早的日语学习工具书。^①

王治本(1835—1908) 字维能,号黍园,又作漆园,别号梦蝶道人,浙江慈溪人,王仁乾族兄。1877年应日本汉学家广部精之邀赴日,先后任日清社、同人社汉语教师,后自创诗社“闻香社”,与大河内辉声交情深厚。据《大河内文书》,1878年9月初被聘为公使馆试用的“学习翻译生”,代为起草文书,并翻译日本诗文。1879年1月调任神户领事馆随员,旋即归国参加科举考试,4月复来日,寓居大河内辉声家,任其汉诗文教师。后多次漫游日本各地,1906年归国,两年后卒于故里。著有《栖栖行馆诗稿》、《舟江杂诗》等,此外尚有大量笔谈及为日本人所撰的序跋存世。^②

王藩清 生卒年不详,字体芳,号琴仙,浙江慈溪人,王治本表弟,秀才及第。1877年7月赴日,初任日清社汉语教师,后以文为生,工书画,善音律。著有《翰墨遗徐香》、《清国王琴仙书画状》、《桃园结义三杰帖》等。

张滋昉(1839—1900) 《大河内文书》中作“张薰昉”,字袖海,号浮查散人,北京大兴人。1879年赴长崎,翌年赴东京,先后在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驻日公使馆东文学堂、东京帝国大学等任教。1899年回国,翌年歿于上海。

冯雪卿(1844—1926) 名沅,字雪卿,号卧云,以字行,浙江慈溪人。青年时游沪,从钱塘吴鞠潭学书,画则师嘉兴朱梦庐,与任伯年、胡铁梅、舒萍桥友善。1875年以后,历游鄂、湘、川、粤诸省,嗣又东渡日本,受聘东亚语学校,长期教授中国书画及汉语。

除此之外,本书笔谈中所见寓居日本的汉土人士还有叶松石、卫铸生、周幼梅、陈曼寿等人。

3. 游历日本之文人

明治初期,尚有一些文人或应邀或自费游历日本,留下了一些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其中尤以王韬和李筱圃最为著名。

王韬(1828—1897) 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弢园老民、蘅华馆主

① 参见中国宁波网2010年7月1日《慈城发现100多年前出版的日语词典》。

② 参见王宝平:《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载《文献》2009年10月第四期。

等,江苏苏州人,近代著名思想家,著有《普法战纪》、《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西学原始考》等。1879年4月至8月,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游历日本长达四个月,先后考察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地,撰成《扶桑游记》三卷。所到之处,受到日本友人的盛情款待和热情欢迎,本书笔谈资料之中,王韬名字频繁出现,足见其在日本影响之深且广。

李筱圃 生卒年不详,江苏扬州人,曾任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抚民同知。于1880年5月4日自上海出发,7日抵达长崎,先后游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6月16日归国。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有一部题为《日本纪游》的东游日记,作者却作“阙名”。日本已故山形大学教授佐藤三郎先生根据《大河内文书》“庚辰笔话”中的笔谈资料,考证出《日本纪游》的作者即为李筱圃。^①20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曾将《日本纪游》收录其中,作者标明为李筱圃。^②

(二) 日本人

自1877年11月底初抵日本,至1882年3月任期届满,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驻日四年有馀,由于能与日本文人通过笔谈自由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沟通障碍。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③可见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河内辉声(1848—1882) 又称源辉声、源桂阁,本姓松平,幼名恭三郎,名辉声、辉照,号桂阁,幕末高崎藩(今群馬县南部)藩主。曾任幕府陆军奉行,1869年为藩知事,1871年因废藩离任,后为华族。

1878年2月25日,在王治本及沈文荧的引荐下,大河内首次拜晤公使何如璋。自此,大河内频繁造访公使馆,风雨无阻,殆无虚日。有时带来的是旧藩主(如越前丸冈藩藩主有马道纯、大和高取藩藩主植邨家壶等),他们大都在废藩置县后被封华族,远离政治,专事风雅;有时带来的则是旧臣(如松井强哉、高木正贤、谷山之忠、山田则明、宫部襄等);更多的时候则是与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汉学家老友聚首公使馆,同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人尽情笔谈,以加深对

① 佐藤三郎:《关于〈日本纪游〉的作者》,载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总143期,1960年5月。

② 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晓秋标点、史鹏校订),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黄遵宪:《中学习方法序》,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241页。

中国文化的理解。笔谈中,大河内屡屡尊称仅仅年长十岁的公使何如璋为“慈爹”,就充分体现出其对中华文明的顶礼膜拜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内在与中国文人交流时,即使对方会说日文或带有翻译,也明确表示更愿利用笔谈。如1878年2月25日大河内首次造访公使馆即言:“自今以后,每访两公使,不宜待魏少年之陪侍,却为笔话之妨害。”1878年3月1日作《钦差大臣公署初谒作寄梅史沈君一律》诗曰:“不假辩官三寸舌,只挥名士一枝毫。莫言东海几蛮语,叙谈通情何可劳。”1878年6月16日又言:“弟口讷不喜口谈,惟以一枝笔换千万无量语言。”^①其目的是尽量留下清人墨宝,作为大河内家永世纪念。甚至在给中国友人写信时,大河内也不忘最后附上一笔“尊覆赐此余白”,并为对方回信留出充足空间,以便更好保存这些来往信函。

每当在公使馆见到新的面孔,大河内都会要求与对方笔谈。而每次笔谈之后,大河内都会精心整理,用红笔对笔谈中的人物、地点、动作、摆设、酬唱、信函等进行细致的补充说明。为便于分辨笔谈作者,大河内用红笔写上对方的一个名字,如以“如”字代何如璋,“斯”代张斯桂,“公”代黄公度,“梅”代沈梅史,“泰”代王泰园,“桂”代源桂阁,“鸿”代石川鸿斋,“省”代龟谷省轩等。另外,对于每次笔谈(大河内皆用“笔话”二字),皆按年月日进行编号,精心整理,装裱成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笔谈具体场景提供了极大便利。

据大河内生前好友龟谷省轩所撰《大河内桂阁君墓碑》:“君天资敏捷,善文辞,工笔札,有诗数卷,清韩笔话百卷藏于家”,这些笔谈后皆移至大河内家的菩提寺——位于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的平林寺内。而据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先生统计,现存笔谈共计73卷71册,包括笔谈原件以及实藤惠秀与佐藤三郎先生根据笔谈原件抄录者(以下简称“实藤抄本”)。^②实藤先生将这些笔谈资料通称为《大河内文书》,今主要藏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968年,实藤惠秀、郑子瑜两先生将其中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部分整理刊行,名曰《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话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后郑子瑜先生又对《笔谈遗稿》进行修订,最新改订本《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本书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资料”主要根据《大河内文书》中的“戊

① 引文皆见本书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资料”。

② 参见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话遗稿》“实藤惠秀序”,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554—558页。

寅笔话”(原有26卷,现存25卷,缺第24卷,其中第6卷及第15卷为实藤抄本)、“己卯笔话”(原有16卷,现存15—16卷,缺第1—14卷,其中第16卷为实藤抄本,与庚辰笔话第一卷合为一册)、“庚辰笔话”(原有10卷,现存9卷,缺第10卷,其中第1、4卷为实藤抄本)编校整理,除吸收了前述《笔谈遗稿》中的相关成果外,还补充了何如璋、张斯桂、沈文荧、王泰园及其他公使馆员与大河内等日本友人的大量笔谈资料。

宫岛诚一郎(1838—1911) 字栗香,号养浩堂,幕末米泽藩(今山形县南部)藩士。自幼接受汉学训练,被誉为神童,曾任藩校“兴让馆”助教。幕末曾作为米泽藩的情报人员被派往江户及京都等地,戊辰战争期间,为谋求东北列藩联盟而东奔西走。明治维新后曾任左院议官、修史馆御用挂、宫内省御用挂、宫内省华族局主事补、爵位局主事补等,1896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著有《国宪编纂起原》、《养浩堂诗集》等。

据笔谈资料可知,宫岛初次访问位于芝山月界院的公使馆,是1878年2月15日,该日与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宫岛与黄遵宪的初次晤谈,则为4月19日,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尤其是该年11月,公使馆迁至华族会馆新址后,由于宫岛家离公使馆只有一街之隔,交往更加密切。其间情形,诚如宫岛在《养浩堂诗集》序所言:“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而黄遵宪后来也在《续怀人诗》其七怀念宫岛时咏道:“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麝尘”(《人境庐诗草》卷七),足见两人往来频繁,交情深厚。值得注意的是,宫岛一方面通过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诗文交流,增进感情;另一方面却又利用与公使馆员的笔谈,暗中为明治政府提供有关琉球归属交涉等方面的情报。

宫岛与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及继任公使黎庶昌等人,皆有大量笔谈,这些笔谈资料今多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及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有《宫岛诚一郎文书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编有《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目录》,以方便研究者利用。此外,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鱼住和晃先生也收集了不少笔谈原件的照片及其复印资料,编有《宫岛家文书收录资料目录》。^①

由于宫岛不像大河内那样每次笔谈后立即整理,因此《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原件散乱情况相当严重。1882年5月9日,宫岛在整理笔谈资料时就曾慨叹:“以上清使笔谈,偶然存篋底者,收录以净书。其不存者,加倍之。诚可惜!诚

^① 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

可惜!”^①可知早在首届公使馆员任期届满的1882年,就有一半笔谈已经散佚。

1893年,宫岛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首届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重新整理誊录,编为五卷,今第二卷封面尚有宫岛长子、著名书法家宫岛大八(号咏士)的题签《栗香大人与支人之间答录》。^②《问答录》记录了自1878年2月15日初晤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至1882年3月于横滨送别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的全部过程,可谓经宫岛本人系统整理的最为完整的笔谈资料。而宫岛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一些笔谈原件,则散见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及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宫岛文书内。陈捷博士曾将宫岛与黄遵宪的笔谈部分,整理为《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本书第二编“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资料”即以早稻田大学所藏《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问答录》为底本,并据笔谈原件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的笔谈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编校整理。

石川鸿斋(1833—1918) 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三河国(今爱知县)丰桥人。著名汉学家,工诗画,著有《日本文章规范》、《鸿斋文钞》等四十餘部。

由于石川鸿斋住在芝山月界院公使馆附近,1878年春便携知恩院大教正彻定、天德寺少教正义应二僧来访。开始,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人皆误以为石川亦沙门中人,鸿斋乃作诗自辩,众人相继唱和,以为笑谈,后石川将此诗文酬唱编为一书,名曰《芝山一笑》。名字由来,据王治本序:“夫曰芝山,详其地也;曰一笑,白其诬也。”

《芝山一笑》由日本东京文升堂于1878年8月28日刊行,乃近代以来第一部公使馆员与日人之间唱和的诗文专集。虽然封面题签曰“清钦差大臣何如璋、同钦差副大臣张斯桂、日本石川鸿斋赠答”,但实际上收录了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刘寿铿、廖锡恩、潘任邦、何定求八位公使馆员及寓日文人王治本、王藩清与石川鸿斋间的酬唱问答,并附有秦苏山、青木可咲、太田晴斋、西岛睡庵以及黄遵宪、沈文荧等人的诗评。卷首有沈文荧、王治本、源辉声、清泽秀等人所作序文,卷尾有彻定、义应、冈千仞的跋文以及藤原忠负、桂香、西岛俊、青木可咲、小野愿、松井操、增田贡、龟谷行、森鲁直等人的诗文题识。虽然龟谷省轩在题识中指出,这些诗文酬唱“大率一时仓猝之作,未暇求其工致”,但诚如沈文荧序中所言,“贤士大夫,联骑骈毂,往来过从,欢若一家,觴酒豆肉,言

① 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12“清国公使笔谈”。

② 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7,目录题作《栗香大人与支那人之间答录》。

笑宴宴,此盖千古以来所未有也。”尚有其重要价值。

《芝山一笑》不同于本书所收的其他各编,并非纯粹的笔谈资料,但由于诗文酬唱亦属当时文人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内容大多可与其他笔谈资料互证互补,故一并收录于本书。

冈千仞(1833—1914) 名千仞,字振衣、天爵,通称启辅,号鹿门,仙台藩人,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史学家。早年求学于藩校养贤堂及江户昌平黉,博通经史。因勤王有功,历任修史馆编修、东京书籍馆干事等职。后因不满藩阀专制而辞官,以教导学生及著述自娱,著有《尊攘纪事》、《北游诗草》、《观光纪游》、《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三百餘卷。

冈千仞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以及游历日本的文人王韬等均有密切交往,其日记及稿本等今藏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包括冈千仞自身整理的《莲池笔谭》、《清讌笔话》手稿本,以及与黄遵宪的笔谈原件。这些笔谈资料已由陈捷博士整理发表于《日本女子大学纪要》(人间社会学部)第12期(2001年),其中有关黄遵宪的笔谈部分,则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书第四编则以此为基础,收录了1878年8月1日、9月20日以及1979年3月的全部三次笔谈,并据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原件进行了校订。

增田贡(1825—1899) 名允孝,号岳阳,骏河国田中藩(今静冈县藤枝市一带)人,明治时期汉学家。曾任藩校日知馆教授、田中藩家老等,维新后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汉文教谕。著有《清史揽要》、《满清史略》、《唐宋八大家丛话》等。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资料室藏有增田岳阳自身整理的《清使笔语》卷三及卷四手稿本(卷一及卷二已佚),所记与王韬等交流颇多,可补《扶桑游记》之遗漏。与《大河内文书》不同,《清使笔语》已将笔谈中的粗鄙内容全部删除,恰如增田1879年8月23日笔谈所言:“酒间谐谑,属鄙猥之言,舍旃不载。”

《清使笔语》卷三、卷四的全部内容,已由陈捷博士整理发表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43期(2003年3月),部分内容则收入《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书以此为基础,并根据增田手稿本以及王韬的《扶桑游记》进行了校订。

(三) 朝鲜人

除了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金宏集(1842—1896) 本名金弘集,为避清高宗讳而改为金宏集,字敬能,号道园。1880年作为修信使访日,带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成为朝鲜开化运

动的积极推进者。后任左议政,三度出任总理大臣,推动官制改革、断发令及废除科举等,1896年被民众所杀,谥号忠献。

1880年8月,朝鲜任命礼曹参议金宏集为修信使。一行共有58人,包括别遣汉学堂上李容肃、军官前中军尹雄烈、书记司宪府监察李祖渊、书记前郎厅姜玮等,其中有不少人为日后的朝鲜开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一行于1880年8月11日抵达东京,滞留近一个月,于9月8日(八月四日)离开东京,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

在日期间,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共进行了六次笔谈,为弥补笔谈不能尽意之憾,何如璋命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以赠之,这些笔谈资料(“大清钦使笔谈”)及《朝鲜策略》皆收录于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记》。笔谈原件今已不存,《修信使日记》则有两个版本:其一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所收之翻刻本^①,其二为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②,乃影印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之抄本。本编以《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影印本为底本,参校国内所整理的有关何如璋、黄遵宪与金宏集的笔谈资料。

以上是有关本书笔谈主要参加者及笔谈资料情况的介绍,至于笔谈中出现的其他人物,请参考各编注释;而有关编校时的注意事项,则请参阅各编的“编校说明”。

三、笔谈资料的文献价值

如上所述,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毋庸置疑,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它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宝库。

^①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修信使日记卷二〈朝鲜策略〉》,1985年版,160—171页。

^② 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高丽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306—313页。

(一) 笔谈资料与外交

1. 笔谈资料与琉球归属交涉

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面临的最大的外交课题,便是琉球的归属交涉问题。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和日本之间,作为独立王国存世五百余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招抚琉球的中山、山北、山南三国,三国开始朝贡,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自此直至清末的五百年间,中国共向琉球派遣册封使24次,其中明代16次,清代8次,一直维持着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册封朝贡关系。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入侵琉球,掳走国王尚宁,一方面对琉球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允许其继续对清朝纳贡,由此形成对中日的“两属”局面。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制推行“琉球处分”,于1872年废除琉球国而设琉球藩,要求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琉球国王派使者向清廷求援,由此展开中日之间有关琉球归属的外交交涉。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将其与宫岛有关琉球的私人日记《养浩堂私记》^①加以比照,其特色更加明显。《养浩堂私记》详细地记录了有关琉球归属交涉时的内幕,可作为本书第二编的背景说明。一方面,宫岛通过诗文酬酢,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结成了深情厚谊;另一方面宫岛又充分利用这种私交身份,将所获的清廷有关琉球交涉的最新情报,迅速传达给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明治高官,成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动态的主要线索之一。^②

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文修养,利用笔谈等方式可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务省曾考虑让他负责对华接待工作,据宫岛《养浩堂私记》卷二:“顷者,外务省有内谕,愿采用余为清国应接之差”云云,但宫岛经过斟酌后认为:“予亦自左院废院以来,深考时势,轻举妄动,贪一时之荣利,素非所好。况今日与清国公使谈话,乃两国交欢之始,仅皮肤之谈而已。其心术如何,却在闲谈交际之中,今若公开供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时,却不免嫌忌。”^③与大久保利通商量后,谢绝了外务省的工作。大久保利通告诉宫岛:“闲谈之交际,反

^① 《养浩堂私记》十册,见鱼住和晃:《宫岛家文书收录资料目录》(神戸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所收“一、缩微胶卷收录资料”之“2.《养浩堂私记》十册,宫岛诚一郎撰,手抄本”。

^② 详见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载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352—365页。

^③ 以下引用《养浩堂私记》,除标明原文为汉文外,均为作者自译。